

全球化与地方化语境下的中国人类学本土化

陈兴贵

(厦门大学 人类学与民族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作为建立在西方知识体系下建立起来的人类学,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语境下,它的研究也面临着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中国人类学本土化是中国学者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学科知识自觉化努力和地方化话语的表达途径。人类学要实现本土化需要在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建立很好的沟通,本土化的人类学既要能够与世界沟通,又要有自己的特色,要在人类学基本理念的基础上进行学科体系的建构。

[关键词] 全球化;中国;人类学;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861(2009)04-0018-05

全球化是一个世界经济、文化、政治不断加强联系的过程,全球化并非是政治、经济、文化某一方面的单独加强,而是全方位的多重联系的加强。全球化不等于是一体化、一致性和同质性。全球化也不能简单的看成是美国化或西方化。本土化作为一种与全球化所倡导的统一性、同一性、同质性相对立的差异性、异质性和多样性的发展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受到民族主义、国家主权、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多样性的影响,地方化被彰显为一种反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有力工具。

一、摆脱西方中心论话语,追求地方性知识和本土的阐释

人类学自19世纪中叶形成成为独立学科以来,一直是在西方知识体系下来思考世界范围内的人类及其文化发展历史、现状的。文化人类学是作为世界人类学开始的^[1]。人类学对人类文化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发现人类社会及文化的发展规律和本质。在早期人类学的研究中,贯穿着一种世界性的视野,即力图在世界范围内建构一种普适性的规律。“人类学曾一度关注文化特质是如何传遍世界的,却也将它的对象划分成彼此分离的个案,每个社会都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它们被想象成一个整合的、封闭的系统,与其他同样封闭的系统相对立。”^[2]然而,人类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加之研究方法、视角、价值观、资料缺乏等因素,造成了早期人类学对文化

的研究并未获得强有力的结论,最终沦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下的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建构。这种研究受到了后期人类学的尖锐批评和深刻反思。因此,当代的人类学研究不仅关注作为全世界文化整体性的基本特性和发展规律,同时也基于各自文化的特殊性而强调了对文化内在的结构、象征、意义、功能的分析。在积极探索人类文化发展基本规律的同时,更加强调以文化相对论的视角来阐释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文化的多样性事实。全球化的发展促使人类学对某一单一文化的研究不再是封闭的、孤立的进行,而是将其放到更大的全球视野里进行考察地方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变迁、认同、异化、抗争、复兴等问题。

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科学的研究面临着新的挑战 and 机遇。人类学作为一门产生和发展于西方知识体系下的学科,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学科特点,早期被赋予了“殖民主义”学科的性质。人类学作为研究人类的科学,当全球化已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时,人类学也必然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并将积极参与到全球化的论争中来。人类学家已经认识到全球化是在很多领域如文化、经济、政治、环境保护等同时出现的复杂的、多样的过程^[3]。在全球化的视野下,人类学的知识体系将要不断地得到更新,传统的那些基于西方与非西方二元对立形态下所产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必将在新的世纪里获得新的认

[收稿日期] 2009-09-10

[作者简介] 陈兴贵(1979-),男,云南省会泽县人,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200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化人类学、民族文化研究。

识、解构、批判和重构。从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关系角度来思考人类学的西方传统与非西方传统,可以看到这两种之间似乎存在着许多的相似性,全球化最初源于西方国家的经济一体化,是以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经济为基础的,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强势的经济力量不断向弱势地区渗透的过程。地方化则强调一种非西方国家对西方强势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对抗和自我权力的张扬,它希望获得一种基于自身传统基础上的新的发展途径,它以传统的优势来化解全球化带来的一体化威胁。

传统的人类学研究对象是那些处于封闭、孤立、原始的族群。然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这样一种理想的“文化孤岛”已经很难找到,曾经被视为“与世隔绝”的族群无一不被卷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中。在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学经典田野对象已不复存在,无论是非洲、还是西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或是美洲的印第安人,都已被悄无声息的纳入了世界体系这个巨大的网络中。人类学家莱塞指出“人类的影响是普遍的……人类社会(史前社会、原始社会或现代社会)都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开放的系统……它们不可避免地与其他或远或近的群体发生复杂的关系,共处在蛛网和网结般的联系之中。”^[4]“全球化也对一些人类学家怎样做他们的研究工作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不再是在单一一个村庄做田野工作,人类学现在经常被迫在许多地方做他们的研究。”^[5]在这样的情势下,人类学的研究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传统人类学研究对象的缺失,人类学到什么地方去寻找田野调查的对象?传统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是基于西太平洋岛屿、非洲、美洲、澳洲等地那些相对来说受全球化影响较小的族群基础上而得出的,这些理论和方法是否能够适用于解释全球化背景下的同类问题?基于西方传统知识体系下的人类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否能够成为非西方国家人类学研究的指导性理论?人类学是否也要建立一种与全球化相对应的地方化的概念、方法和理论,这种地方化的知识系统是否也应该具有全球化的性质?如果地方化的人类学知识也需要参与全球化的对话,那么这种知识如何才能够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

文化全球化强调的是世界各地的文化不断走向同质化、一体化甚至一元化的过程。但人类学的研究则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它更加强调的是地方化、本土化以及异质化的过程。这种认识是基于对全球范围中多样性文化的研究和积累。全球化是以不断进行的相互交流为基础,以人们的想象力创造出的

“被单一化的想象空间”的文化过程为前提。这一“想象的空间”是由全球范围内的不同社会文化中的不同的群体,根据所处的历史与社会背景而建构出来的一个多元的世界。以这一“想象空间”为前提的全球化与地方化以及文化认同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学所关心的热门话题^[6]。作为对全球化回应的动态的文化相对论的把握,萨林斯指出,“形成各种文化的世界文化体系、一种多元文化的文化,因为从亚马逊河热带雨林到马来西亚诸岛的人们,在加强与外部世界的接触的同时,都在自觉地认真地展示各自的文化特征。这一具体的事实就是本土的或地方的文化认同、地方共同体主义以及在多元民族社会的民族主义在世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复苏、复兴和重构的势头。”^[7]格尔兹则以地方性知识的阐述和分析,回应着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性知识的内在特性和价值,以文化相对论的视野突出了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和地方性。在全球文化发展和交融的时代,在一个大变化的时代里如何生存和发展,怎样才能多元文化并存的年代里,真正做到“和而不同”。人类共处的问题要好好解决,这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生命的代价。所以一切要以人为本,才能得到繁荣和发展。在现实中,全球化也带来了一种边缘性,边缘层还会不断地从自己的角度进一步强化自身的认同和地方性。这一地方性甚至是族群性的认同,常常和文化的生产和再造联系在一起。费孝通先生从人类学的视角,把“和而不同”这一来源于中国先秦思想中的文化精神,理解为全球化过程中的文明之间的对话和多元文化的共生,可以说这是建立全球社会的共同的理念。这一“和而不同”的理念也可以成为“文明间对话”以及处理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一条原则^[8]。

二、作为知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人类学本土化努力

社会科学本土化是西方文化体系与本土文化体系矛盾,冲突、斗争的缩影^[9]。基于西方知识体系下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在“知识全球化”的过程中而不断的渗透于非西方的国家知识体系里。中国的人类学的传入、发展也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完成的。中国早期的人类学研究基本上都是以西方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为直接指导思想的。此后中国的人类学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中断了对西方人类学的引入、借鉴和运用,然而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仍然继承着对西方国家的人类学传统。进入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重建,人类学本土化的论题日益成为了中国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

问题。人类学的本土化可以看成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地方化表现。这一论点的基本价值追求在于,深入思考基于西方传统的人类学知识体系是否完全适合于非西方国家的人类学研究?如果西方的人类学知识不适合于非西方国家的研究,那么作为本土化的人类学应该建立怎样的学科知识体系?这里将以在中国人类学界近些年来讨论比较多的中国人类学本土化为主题,来分析在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视野下,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取向与发展。

人类学的本土化是中国人类学者乃至世界许多人类学家不断努力的一个目标。它作为一种对全球化的回应,在民族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引起了本土学者的极大关注。在对人类学本土化的论争中基本围绕着这样几个问题来展开。中国的人类学是否要摆脱西方的人类学知识体系,重新构建一种新的人类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本土化的人类学与西方人类学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本土化的人类学是否能够与西方人类学进行对话,也就是说基于非西方传统基础上而得出的理论和方法,能否得到西方人类学的承认?

为什么要有人类学的中国化?英国人类学家王斯福认为对中国的学术界来讲,本土化的原因既有来自外在环境的,也有来自本土的民族中心主义的^[10]。换句话说,人类学的中国化是当今世界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中国本土人类学家为了能够在世界人类学领域获得认可,取得独立的学科影响力,并为世界人类学之发展做出贡献而发展起来的。当然这种本土化的强烈要求也反映了中国学者对西方知识体系全球化的一种抗争和努力。有学者也指出,之所以提出人类学中国化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类学还是处于恢复发展状态,理论和方法上还不成熟;中国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多彩,民族众多,相比较而言,人类学的研究恰恰很少;应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说明或者帮助解决中国社会与文化问题方面,我们的成果还很有限;人类学在中国对许多人来讲还是陌生的,在社会上还没有取得大众的认识和认可,所以需要本土化。在笔者看来,人类学中国化问题的提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人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要求中国的人类学必须关注中国问题^[11]。人类学不仅要研究非西方社会以及一个国家或地区中的边缘族群或少数民族,而且还要研究作为主体的多数族群。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费孝通、林耀华为代表的中国人类学者就已经开始了人类学中国化的努力和尝试,他们所创立的社区论学派开创了本土学者研究中国主体

民族汉族的先河。这种尝试和努力得到了世界人类学的肯定,成为研究中国汉人社会的典范;二是中国复杂多样的社会、文化状况,要求必须建立自己的一套解释模式和研究方法,才能达到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正确认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与传统人类学所研究的非洲腹地、西太平洋岛屿、澳洲等地社会与文化都具有较大的差别。因此,传统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并不能够有效的解说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状况;三是全球化的影响下,西方的人类学知识也难以摆脱西方文化霸权和政治霸权的话语控制和影响,西方人类学在看待中国社会与文化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非西方”的视角,将中国文明放在了与西方文明截然对立的层面上来思考,这样一来势必对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误解与偏差。因此,人类学的中国化,作为一种对西方人类学知识的借用、批评、反思、解构和建构,能够在传统人类学的知识体系下,基于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实际情况,提出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符合中国实际的人类学理论和方法,从而推动中国人类学进入世界人类学的行列,并为世界人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西方人类学家与中国人类学家在人类学如何实现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对话中既有共识性的方面,也有许多差距和观点上的差异。其实这种差异正好反映了在两种不同文化传统基础上而造成的地方性差异。英美的人类学家在讨论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时候,其所在的立场是一种全球化的视野,而非一种完全的地方化情结。他们更强调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不能太“地方化”,应具有全球视野。如王斯福就认为不应太强调中国的独特性,而应强调人类学在当前的国际学术背景之下有很多共通之处。他希望未来的年轻学者在本土化的构建中应当面向国际学术界,谋求共同发展,从全球的开放性、共同性出发,更多地接受人类学这门学科共同遵守的一些原理、概念和方法^[12]。英国牛津大学的彭轲教授从一个全球的人类学视野来透视人类学本土化的问题,他认为中国人类学如果渴望成为植根于中国学术发展和中国社会并为之相关的学科,它就应摒弃那种狭隘的仅仅致力于研究中国本身及其“少数民族”的做法,而应意识到着手中国以外的实地考察才具有巨大的意义。拓宽田野工作的范围和超出中国去进行理论阐述将会使中国人类学不再是独霸天下的美国、欧洲或日本人类学的边缘支脉。为了成为世界人类学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中国人类学应该提出一些能引起其它国家人类学学者关注和思考的论点,而不仅仅是为他人提供有趣的资料和优秀的学生^[13]。当然

一些非西方国家的人类学家在谈到人类学的中国化问题时,也体现出了与英美人类学家不同的观点,如西班牙的迪西柯(Gabriel Decicco)教授提醒中国人类学家在谈本土化时应该分析西方人类学家们在人类学领域内所取得的成果,然后在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框架和感知系统内重新铸造这些成就。他认为,人类学本土化必须从积极的方面加以构建,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也不可能完全抛弃西方的理论,更不应搭建障碍,排斥非本族人在这个伟大民族的疆域进行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工作^[14]。

与欧美人类学家不同的是,作为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人类学者则提出了与此不同的观点,他们明显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性情结,将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视为是与西方人类学截然不同的人类学知识体系。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在谈到人类学本土化时指出,“人类学本土化,不但应该包括研究的内容要是本地的、本国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研究的方法上、观念上与理论上表现出本国的文化的特性,而不是一味追随西方的模型。”^[15]香港中文大学的陈志明教授认为,人类学本土化实际上是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人类学的反抗^[16]。黄淑娉教授认为,人类学本土化就是要学习、吸收西方人类学的理论、方法、经验,研究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的问题,从本土的实践中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根据中国的经验提出新理论、新方法,以中国的特色对世界人类学潮流的发展作出贡献^[17]。广西民族大学的张有隽教授认为,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应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通过这种研究得出的理论和方法,能科学地解释中国社会和文化,并能检验、修改、补充人类学理论方法,丰富国际人类学知识体系;人类学本土化得出的成果有利于解决中国社会与文化问题^[18]。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纳日碧力戈副研究员认为中国人类学的本土化是整个 20 世纪中国“现代化”努力的一部分,它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情结,一种话语。人类学的本土化不是单纯的学术探索,而是和西方的对话,是对外开放中与诸强国在政治和经济上不平等的“悲愤之鸣”^[19]。廖扬认为,中国人类学本土化问题的重新提出、讨论和实践,实际上是对西方人类学理论方法的批评、反思和对其文化霸权的解构,消解国内外文化“殖民遭遇”,填平“文化鸿沟”,并力图创建起适合于中国社会的本土人类学体系^[20]。何星亮认为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人类学本土化的关键。21 世纪的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应大力加强创新意识,发扬科学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只有

不断的创新,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地向前发展。也应该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的综合精神,应综合世界各国人类学之长^[21]。周大鸣认为,人类学“本土化应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保持术上的独立地位和保持本土的特色为本土服务,另一方面要注意学术的普遍性或者说世界,使本土人类学能与世界同行交流,并为世界作出贡献。”^[22]由此可知,作为本土成长起来的中国人人类学者,明显的具有了地方化的情结,力图通过彰显地方化特色来回应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话语霸权和文化普世主义。

综合以上中外学者对人类学中国化的有关论点,笔者以为,人类学中国化的提出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非西方话语的表碣努力,通过这种努力,使非西方国家的学者能够在全球化领域中获得一席之地。在笔者看来,人类学的中国化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要对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历史有一个准确清晰的把握,中国的人类学发展历史较短,对西方的人类学理论始终未能获得系统的研究和分析。因此,当前的中国人类学仍然需要在学习人类学理论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只有知己知彼,方能建构新的理论。第二,要明确意识到人类学的中国化并不仅仅是研究对象从少数民族转移到汉族,也不是从乡村转向都市,也不是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理论,而是在研究对象、方法、指导思想、理论建构、观念更新、概念提出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的探讨。第三,中国化的人类学不能只是中国的,而应具有全球性,也就是说理论、方法、概念、观念等内容不仅要能够解释中国的现象而且也要能够为解释人类社会的普遍性问题有所裨益。人类社会的发展证实,世界各地的人们很早就处于一个相互交流和互动的过程中。“人类世界是一个又诸多彼此关联的过程组成的复合体和整体,这就意味着,如果把这个整体分解成彼此不相干的部分,其结局必然是将之重组为虚假的现实。”^[23]因此,中国化的人类学应该尽可能的避免将研究对象置于某一封闭的群体内,不能人为的割裂研究对象与世界的在外联系,同样的也不能将中国与世界割裂开来,要将对中国的研究放在世界视野中进行。人类学的中国化并不应该将研究对象、视野局限于中国这个地域范围内,而是应该放到更大的全球范围内。当前有一种误解,认为利用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就是人类学的中国化。笔者以为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如果只是简单的借用西方人类学中一些理论、概念和方法,事实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方的话语霸权。中国化的人类学应该具有一种全球性的视野,不仅要进行中国的

文化研究,更要进行全球性的跨文化比较分析,在比较的过程中,提升出相关的理论和方法,方能使中国的人类学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应有的地位。第四,中国化的人类学应该谨慎对待人类学名称的滥用。对于人类学的学科涵义,我国的学术界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模糊认识。例如近几年涌现出来的许多冠于人类学头衔的学科:经济人类学、教育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人口人类学、影视人类学、视角人类学、审美人类学、体育人类学、宗教人类学、戏曲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美术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等等。“虽然这些学科的建立具有其合理性,但是从某个角度而言,它也反映了一些学人对人类学的误解,把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体系直接等同于它的学

科体系,从而使人类学面临泛化或消解于各个学科之间的危险。”^[24] 笔者以为,在中国能够出现如此多的人类学成果是让人欣慰的。然而翻看相关成果后,则有太多的失落和感叹。这些成果要么完全就没有人类学的味道,要么就是人类学知识与相关主题脱节。难怪这样一些成果未能得到世界人类学的认可,因为这些成果实质上并不是真正建立在人类学理念、理论、视角、方法基础上的,只不过是冠于了人类学的名称罢了。最后,笔者认为中国的人类学要实现真正的本土化,必须从最基本的民族志出发,用本土的语言、思维、习惯、方法撰写高质量的民族志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的人类学既能与世界人类学进行对话,又能充分展现中国的地方化特色。

[参考文献]

- [1][2][4][23] (美) 埃里克·沃尔夫著,赵丙祥等译. 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M]. 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20; 8; 27; 7.
- [3] Jonathan Xavier Inda and Renato Rosaldo. The Anthrology of Globalization.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10.
- [5] [美] 詹姆斯·皮科克著,汪丽华译,人类学透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6
- [6][7][8] 麻国庆. 费孝通的第三篇文章: 全球化与地方社会[J]. 开放时代,2005(4): 11; 11; 15.
- [9][22] 周大鸣. “中国式”人类学与人类学的本土化[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 32; 34
- [10][11][12][14][16][17][19] 高崇,邹琼. 从本土走向全球的中国人类学[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4): 49; 50; 49; 49—50; 50; 50; 50.
- [13][英] 彭轲著,周莉译. 本土化: 中国人类学追求新的关联与平等的策略[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9(4): 4.
- [15] 转引自何星亮. 论人类学的本土化与国际化[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 21.
- [18] 张有隽. 对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的几点看法[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1): 14.
- [20] 廖杨. 关于人类学本土化的几个问题的思考[J]. 贵州民族研究,2000(3): 17.
- [21] 徐杰舜,何星亮. 创新: 人类学本土化的关键[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0(4): 28.
- [24] 朱国佳. 台湾人类学田野调查理念与方法[J]. 广西民族研究,2001(1): 32.